曹守亮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

一、中共八大路线问题的研究状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八大路线问题的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阶级斗争惯性说。我们党长期处于阶级斗争的环境中，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方式。钟廷豪认为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就是中共没有能够把握住主要矛盾、未能跳出阶级斗争圈子的重要表现。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在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还缺乏认识和正确处理的办法；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激化缺乏思想准备；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处在阶级斗争的最前沿，阶级斗争的惯性作用时刻在冲击、影响党的工作。[②]张弓[③]、陈少晖[④]、沈春敏[⑤]、谭双泉[⑥]等学者也持此种观点。笔者认为，这种答案最先为研究者所注意，但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加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却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努力。

第二，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说。郭德宏和沙健孙等人基本继承了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出的观点[⑦]。郭德宏指出，党的八大路线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的直接原因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等人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还是主要矛盾，从而很快改变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⑧]沙健孙等编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指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 1957 年 10 月至 1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⑨]该种观点从寻找直接原因的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却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第三，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保证机制。张弓指出，由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民主法制不够健全，加之后来林彪等有意地宣扬个人崇拜，使人民和党员的应有权利得不到充分行使。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实际上处于难于受监督和约束的地位，严重妨碍了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⑩]钟廷豪指出：“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一个接一个伟大胜利形势下，党内滋生起一种骄傲自满情绪，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并逐步发展到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从而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同时，也难以使八大正确路线在实践中得到贯彻。”[11]持此种观点的还有张金才[12]和谢春涛[13]等学者，研究者从机制和制度的角度入手使问题的研究大大深入，值得关注。

第四，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结构单一，导致在执行八大路线时缺乏组织保障，这也是八大路线容易中断的原因之一。有学者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的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的知识结构、阶级出身、个性心理、思维方式和领导工作方式等，都与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不完全适应，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贯彻执行八大路线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干扰，从而导致八大路线中断。[14]该观点脱离了当时的客观背景，有求全责备之嫌。

第五，国际局势的影响。张星星认为，“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主义原则，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时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很危险。”并进一步指出，“苏共‘丢刀子’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成为促使中共把传统的阶级斗争经验绝对、教条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一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中共传统革命经验的历史惯性冲击力变得更加强大不可抗拒了。”[15]还有的学者认为，除了苏共二十大给中共八大造成的消极影响外，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国内由此产生的动荡局而，使中共在政治上做出了过敏反应，结果导致了党的主要领导人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16]外因固然是事物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研究问题还是应该更多地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

上述观点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广度，同时也为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二、中共八大路线研究的新进展

下面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出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思考。

第一种观点是八大路线前期准备不足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赞同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即“八大”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是由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如石仲泉等的《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前期党史——学习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之一》（《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朱纯治的《党的八大的历史意义及其路线未能贯彻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孙力的《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等。孙力指出：八大对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三大改造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新的特点认识不深刻，这是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准备不足的一个表现；八大没有指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和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变化，也反映了八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这个不足之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被发展成为一种错误认识，从而为以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指出当时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倾向是冒进，二是没有具体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经济建设的客观条件；八大对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以及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缺乏深刻完整的认识；八大在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同时，仍然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以及对主要矛盾的提法基本上正确但在表述上又不很确切和严密，这都是八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之处。[17]

第二种观点可以归纳为八大路线本身隐含着路线中断因素说。阎朦就认为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也有着一定的矛盾性。[18]有学者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理论误区：“以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变革‘落后’——‘低级’的生产关系，要让生产关系不断‘升级’，并且要建立一种具有超前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来带动或拉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而这也应该算是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无法赞同的思想基础。”[19]邹宇雷则认为，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就其所要表达的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但这个提法，一方面容易使人误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整个地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产生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搞早了、是否不该搞的误解；另一方面又会使人误认为我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已不存在继续改进的问题，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20]张运清认为：“八大在对我国的主要矛盾有所认识但又认识不够深刻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显然不科学。它根本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辨证运动的原理，这说明我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不深刻，也缺乏理论论证。正因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缺乏科学分析……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而重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埋下了党犯 20 年‘左’倾错误的祸根。”[21]齐卫平、赵雷指出：“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加速完成，中共领导对社会制度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八大之前未能对新制度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结论，但比较粗糙，“毛泽东不赞成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却又主张先不要急于修改这个结论。围绕八大做出的结论，当时的理论界进行过专题讨论，但没有形成集中的看法，无助于统一认识。毛泽东后来明确改变了八大的结论，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并逐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改变是战略性的失误，危害是极其严重的。”[22]还有学者指出：“八大《决议》在正确地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之后，又不恰当地下了一个断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产生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理论上的疏忽，更主要是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是不深刻的。毛泽东最早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 1957 年 10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即指出这种提法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23]

第三种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足说。熊吕貌指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认识，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左’倾错误思想泛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24]王璐认为，“八大路线本可以推进中国的发展，但实际上的中断是与当时中国发生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有不可脱离的关系。”[25]武国友指出：“在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方法往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加主观臆断来制定目标，再从目标出发来确定计划，依照计划规定发展指标。从以超英赶美为主要内容的赶超战略来看，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实践的。首先确定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然后再确定超英赶美的计划，最后根据计划来确定具体指标。”[26]也有学者指出，我党当时并未突破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

和固定思维模式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27]“由于教条式理解社会主义，把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如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固守；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搞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经济等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批判。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其结果是处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唯生产力论’。”[28]

第四种观点是对中共八大路线广泛宣传和彻底贯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说。郭大钧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思想还不够成熟，八大的正确方针在党内未能牢固确立，一些重要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或者没有充分地坚持下去，因此，八大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29]有的学者指出：“贯彻八大路线需要最为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这些政策仅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有所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正确路线的理解不透彻，特别是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广大人民群众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极大影响了八大路线在实践中的可行性。”[30]有的学者还指出：八大路线没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广泛的共识，导致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够，这是八大路线中断最根本的原因；群众基础的动摇，导致贯彻执行八大路线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这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31]

第五种观点是八大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不够坚实说。方敏的《中共八大的历史局限》在这方面的文章较为典型。作者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述：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上有不够之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冒进思想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可能具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说法不当；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认识不大清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重要缺陷。[32]洪小夏认为，从八大文件的用语中可以推论我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八大并未明确宣布过渡时期结束，而是仍然沿用了过渡时期的概念，为后来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仍将阶级矛盾视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打开了理论缺口，反映当时全党对过渡时期理论认识不够，存在误区。扩大过渡时期的内涵，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大过渡”理论，最终导致了对八大路线的完全否定。[33]

综合以上各种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对八大本身和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局限进行研究是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一大趋势。

三、中共八大路线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学术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以下五点：（1）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中共“八大”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系到对整个八大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的评价。（2）中共八大所处转折时期的意义似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面临着由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面临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变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样

子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怎样的？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当时的人们必须在事实上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向。（3）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的分歧主要在于：有的学者从中共八大路线本身加以探讨，有的学者则在完全肯定八大路线正确性的前提下，从阶级斗争思维的惯性、社会背景、国际环境、制度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加以研究，还有的学者指出研究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不能用八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笼统的概念来说明，问题的症结点在于如何看待中共八大路线。（4）这个分歧反映出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如果说从各种客观因素方面来寻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反映出研究的广度的话，那么，从八大路线本身来探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反映出研究的深度。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思维方式互为参照，会使学术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得出更加接近于客观历史事实本然的认识。这种分歧的存在有利于推动学术界探索、争鸣和批评风气的改善，有力地促进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5）对于历史的评价，尤其是对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今度古的倾向，这是应该注意的。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有没有提供新的东西。”[34]当然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新材料还应进一步挖掘，研究视野还应拓宽，理论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大力度等。[35]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学术界对这个的专题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综合研究和全面分析。[36]这些主张都是很正确的，增加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自觉性。无疑，对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探索求全责备是不足取的，我们唯一科学的做法就是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其作冷静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对中共八大路线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公开发表的 50 余篇（部）学术论著；关于中共八大的 10 余部资料选编和文献汇编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进入 21 世纪，有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写过一些综述性的文章，如季相林、刘斯琴的《中国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原因研究综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和曲延春的《1990 年以来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研究综述》（《绥化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等。此外，刘德军、孔祥荣的《中共八大研究综述》（《山东社会科学》1996 年第 5 期）、张神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八大研究评述》（《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牛玉峰、黄立丰的《近三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2 期）等文章也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括。

[②]钟廷豪：《试论中共八大正确路线未能贯彻执行的原因》，《北京党史》1997 年第 1 期。

[③]张弓：《关于“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教学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83 年第 1 期。

[④]陈少晖：《新时期加强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历史和时代的需要》，《江苏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⑤]沈春敏：《对“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原因分析》，《长白学刊》，1997 年第 2 期。

[⑥]谭双泉、 熊吕茂：《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浅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

[⑦]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9～360 页。

[⑧]郭德宏：《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2002 年第 2 期。

[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3 页。

[⑩]张弓：《八大的历史意义及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11]钟廷豪：《试论中共八大正确路线未能贯彻执行的原因》，《北京党史》1997 年第 1 期。

[12]张金才：《试析中共八大能够制定正确路线的主要原因》，《中共党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

[13]谢春涛：《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

[14]黎见春：《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中共党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中共“八大”路线中断原因新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 年第 4 期。

[15]张星星：《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

[16]李良明、肖海燕：《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研究概览》，《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17]孙力：《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3 页）、李践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3 册（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5 页） 。

[18]阎朦：《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再认识》，《理论导刊》1997 年第 7 期。

[19]鱼俊清：《论毛泽东改变 “八大”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必然性——兼论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20]邹宇雷：《对未能坚持中共八大路线的历史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6 年第 8 期。

[21]张运清：《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增刊。

[22]齐卫平、赵雷：《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的认识分歧及其后果》，《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23]乌杰主编《回眸世纪潮——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大”珍典纪实》中卷，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01 页。

[24]熊吕茂：《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的再探讨——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 50 周年而作》，《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25]王璐：《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共“八大”路线的中断》，《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26]武国友：《论中共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及其运作中的变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9 年第 4 期。

[27]刘杰：《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

[28]张运清：《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增刊。

[29]郭大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6～97 页。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蒋辅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9 页。

[30]赵蓉、沈蓓绯：《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启示》，《宁夏党校学报》2007 年第 2

期。

[31]黎见春：《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新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 年第 4 期。

[32]方敏：《中共“八大”的历史局限》，《焦作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 期。

[33]洪小夏：《“八大”的启示——讨论“八大”路线未能全面贯彻的理论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 年第 2 期。

[34]《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0 页。

[35]季相林、刘斯琴：《中国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原因研究综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36]曲延春：《1990 年以来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研究综述》，《绥化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6 卷第 3 期。